

# 政府财税增收 理应还富于民

张荣楠

在当前宏观经济数据一片惨淡之下，2011年个税的大幅增收的确算得上是一抹亮色。不过，个税收入、财政收入大大超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速却也隐藏着国家财富分配失衡的巨大隐忧。

## 个税增长远超居民收入增长

个税收入的征收对象是个人，尽管受去年9月1日起实施个税起征点影响，四季度工资薪金所得税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出现负增长，但这并未改变全年税收增长的强劲势头。2011年个税收入同比增长为25.2%，达到3633.07亿元，完成预算的116.4%，增收854亿，远大于去年增收的360亿。

按照财政部的解释，个税增收是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所致，但问题是个税增长并未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而是远远超过其增长速度，201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1%。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8.4%。个税增速几乎为居民收入增速的两倍。

而如果再把口径放大，财政收入同样大大超出GDP增速。2011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是去年GDP增速两倍多，而这正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8年高于GDP增速。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约4万亿元，到2010年超过

8.3万亿元。2006年至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3%，远远高于GDP增速。

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担忧：中国财富分配失衡是否越发严重？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是否该降一降了？其实，无论是否承认，中国税负总水平高是不争的事实。国内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等都曾公布过关于宏观税负水平的测算，但由于选择的测算口径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讲，用“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计算，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

而世界银行曾经进行过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的宏观税负应该在23%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而2007年~2009年，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分别高达31.5%、30.9%和32.2%，远远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合理水平。

# 财政收入应多用于改善民生

孟丽

国家“钱袋子”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财政收入从2002年不足2万亿元，到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10年突破8万亿元，再到去年首超10万亿元，不断迈上新台阶。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的飞涨，是以广大纳税人的沉重负担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应属于国民的财富，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而且国民收入增长水平依然较低，劳动者工资依然普遍较低，各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依然较慢，国民幸福感依然有待提升。所以，在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还富于民”，提升国民的幸福感，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财政收入应当多用于改善民生。在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政府财政支出也在大幅增加，但是这些支出当中，“三公消费”、行政管理费用和政府投资性支出所占比重过大，使得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很难真正发挥加强社会保障、改善社会公共服务、最终回馈社会的作用。政府有了充裕的财力，理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让每一个公民感受到实惠，让整个社会受益。

其次，财政收入应当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财政收入取之于民还之于民

早有先例。在美国俄勒冈州，只要当年州政府税收超过预期总额10%以上，州政府就将部分税款返还给纳税人；新加坡政府2001年起开始执行“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根据财政盈余状况以现金形式向国民派发“红包”。近年来，香港、澳门也有类似的做法。受港澳向市民发放红利的启发，广东省东莞市曾向12.2万低收入户每人发放1000元现金改善其生活水平；2011年4月，海南省向低收入人群派发1.1亿元人民币。国内外一系列财政收入直接返还居民的事例表明，还富于民的实践需要不断拓展，让利于民的意识应该强化。

最后，结构性减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事实上，财政收入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将财政收入最终回归于人民，让“民富”带动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让内需驱动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才能更好地达成“富国”的目标。因此，减税应当成为税制改革的目标，包括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从总体上说，都应当减少。特别是企业要获得发展除了具备优秀的团队和正确的产品市场定位外，良好的外部环境必不可少，而减税就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小企业的创新活动还要给予税收优惠要尽量减税；此外，特定税种也要有增有减，比如个税具有明显的是有减税的特色，但高收入阶层要多交一些税。

## 财税结构不合理日益凸显

这些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应属于国民的财富，这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促进内需，更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发展。与此同时，财税结构不合理问题也日益凸显，税收制度的设计并未真正实现调节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当前，政府税收收入中70%以上都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这意味着我国税收的70%以上由消费者埋单，考虑到恩格尔系数较低，因此，我国税收收入的纳税主力军由中低收入者而不是富裕人群承担，其中中产阶级成为最明显感到税负重的一群体，严重束缚了中产消费能力的释放。

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评估宏观税负的时候了，因为这涉及中国能否进一步提高消费率、能否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以及能否向内需型社会顺利转型的重大问题。

从增幅比、国民收入和GDP增长的横向比较而言，我国的减税空间非常大，实施大规模减税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是起征点需要进一步提高，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提高至4500元至5000元左右；其次，需要调整征税方式，可考虑按家庭收入征税，以实现刺激消费、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国外都是按照家庭为单位收税，而我个国税收一般是以个人为单位，这就没有考虑家庭负担问题。比如，收入相同的纳税个人，纳税金额一样。但由于家庭情况不同，赡养人数不同，家庭整体收入差异很大；再次，进一步改革税制结构，要考虑对基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收入等综合设计税率，达

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

## 应把更多财税收入用于国民福利

此外，国民之所以对政府高税收表示质疑，除了感觉负担重外，也是希望收上来的钱能够更多的用于保障国民福利增长，而不再是把钱砸向大型项目投资。事实上，在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宏观税负高达50%，但总体福利水平要远远高于中国，财政支出的扩大也主要是用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0%至30%。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58.7%、56.7%和57.1%，而相比之下，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整体国民福利水平相去甚远。因此，需要政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用于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上来，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服务，提高国民福利。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稳增长政策加码的重点又被放在了投资身上，这样，不但政策后遗症风险大，也难以持久。事实上，稳定增长，刺激内需最好的政策就是大规模减税。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结构？如何把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转化为居民可直接支配的收入？如何通过全面降低宏观税负真正做到还富于民？如何真正落实提高“中等收入比重”的承诺？正是我们急盼的。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 焦点评论



GDP季度增速三年来首次跌破8

经济增速在下滑，第二季度跌破八。消费挖潜任务紧，出口维稳压力大。推动投资猛药，优化结构是良法。减速之中谋长远，中国前景不会差。

朱慧卿/漫画  
孙勇/诗

# 《基金法》更要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皮海洲

备受市场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7月1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修订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从《修订草案》的内容来看，“松绑”成为《修订草案》的主旋律。《修订草案》适当放宽了有关基金投资、运作的管制，并且开放契约型、理事会的组织形式，非公募募集基金还可以采用无限责任型的组织形式。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修订草案》还为基金经理炒股“松绑”。除此之外，基金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也得以厘清，《修订草案》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实行专业人士持股计划，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并且，基金合并也在《修订草案》中被明确提出

来。可以说，一部《修订草案》极大地保护了基金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很好地兼顾了包括基金经理在内的基金高管的利益。

唯一没有兼顾到的是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基金持有人无疑是冤大头。为了理财，基金持有人把自己的资金大把大把地交给基金公司，但结果却是，理财变成了“散财”。基金持有人的财富被基金公司亏掉了，而基金公司却还要从基金持有人的身上收取巨额管理费，基金持有人因此拿着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的年薪。基金持有人用自己的亏损来把基金公司跟基金经理“养肥”。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广大基金持有人对此次《基金法》的修订寄予厚望，希望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能够得到切实的保护。

但基金持有人的愿望显然落空了。《修订草案》更加重视的是基金公司与

基金经理们的利益，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再一次成为牺牲对象。就此而论，《修订草案》的出发点或许就错了。或者说利益中人绑架了对《基金法》的修订。其结果是基金持有人与投资基金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投资基金更难获得投资人的认同。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基金经理炒股松绑。《修订草案》第十九条规定，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其本人、配偶、利害关系人进行证券投资，应当事先向基金管理人申报，并不得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发生利益冲突。这一规定可以说是深受基金业内人士欢迎的，这实际上就是为基金经理等基金从业人员炒股放行，是符合基金经理等业内人士利益的。

但这一规定却是对基金持有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侵犯。毕竟基金经理炒股是难逃老鼠仓嫌疑的。《修订草

案》为基金经理炒股放行，实质是为老鼠仓提供方便，使老鼠仓公开化。虽然业内人士称，基金经理炒股放开后，可以通过加强监管的方法来限制老鼠仓行为。但如果是监管不力呢？毕竟中国股市的监管水平从来就是低下的，不曾让投资者满意过。

退一步来讲，撇开老鼠仓不谈，就从基金经理合规合法炒股来说，这也是违背其职业道德的。因为基金经理拿的是基金持有人支付的高额薪酬，其职责就是为客户理财，全心全意对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负责。但《修订草案》却允许基金经理炒股，这就像是允许公务员上班时间干私活一样，这是基金经理该干的事情吗？而且基金经理原本就是理财能力有限，责任心不强，如今却还要分散精力来为自己炒股票，这样的基金经理如何能够得到基金持有人的信任呢？远离为自己炒股票的基金经理，这或许将是基金持有人下一步的必然选择。



## 新财富夜谈

# 资本市场 制度性红利已经消失

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7.8%，二季度为7.6%，三年来首次低于8%。在昨日播出的《新财富夜谈》节目中，叶檀与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益谦，中国银河证券资产管理总部的董事总经理汪义平谈论市场，解读“八八”。

叶檀：我们将愉快地接受GDP速度下降，前提是，经济结构好转，带来全民福祉，带来未来百年的社会、经济健康。

对于中国的经济和资本市场，在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担任美国对冲基金总裁并取得27%的年收益的汪义平较为乐观。

汪义平：别人说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我认为它在走上坡路。但是走得比以前慢了。中国的经济有减速吗？中国的经济是按照7.5%以上的速度在成长，它只不过是加速度给降低了而已。没有几个经济体不希望能够成长7.5%的，成长5%就乐到天上去了。所以不能把中国经济看得那么差。

刘益谦：我们的经济是在10%、9%到8%的下降轨道。这么多年为什么“保八”？我认为“保八”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存在的一个基础。“八”能解决我们很多问题。对于我们整个发展，税收各方面是比较良性的。刘益谦是资本市场的传奇人物，不放过每次暴富机会。1990年豫园商城发行股票，每股面值100元。当时刘益谦花了2万多元买了200多股，1年净赚200多万。在“老八股”上获得暴利后，他开始炒卖认购证，同时大量收购内部职工股和申购新股，等待股票上市变现。2000年，刘益谦成立了新理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协议受让或竞拍方式低价大量吃进上市公司的法人股，在流通过后高价抛出，准确把握住法人股流通减持带来的暴利，被称为“法人股大王”。在2012年5月的新财富500富人榜中，刘益谦以150亿元的身价位列中国富豪榜的第三十位，也是榜单上投资行业中最富有的富人。

刘益谦：其实这20年我主要赚的钱，源于资本市场的政策红利。不是说我哪个行业的判断有前瞻，这种方式本身是不具备盈利模式的。这20年总结下来，任何一个赚钱的人，全是赚取制度性的红利。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现在这么大了，这种制度性的红利都没有了。

叶檀：如果说此前20年是政策红利，所以赚钱了。那么现在呢？刘益谦：我前两天看个报纸标题，资本市场连续8周净资本流出，最少的是每周400多个亿，最多的是800多个亿。在这个市场20年，我现在看股票的欲望都没有了。我认为如果是按这种趋势的话，可能我休息一两年我都来得及，我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关心指数多低多便宜。

2009年刘益谦总计花费将近60亿参与7家公司的再融资，三盈四亏。其中地产股的投资说是“拖累”投资业绩的原因，浮亏约为4.4亿。之后两年，刘益谦鲜有出手。今年1月19日，刘益谦

掌控的国华资本认购宗申动力增发股1700万股，定增价为5.44元。7月9日宗申动力股价跌破定增价。

刘益谦：很多人看我花多少亿去买个增发。为什么买增发？因为增发价格，首先是比交易价格便宜20%左右，前提是1年不能流通。假设一年以后这个指数还是这个指数，那我应该正常有一个20%的套利。但结果呢，就相当于我是躲在地下两层楼，一个炸弹炸下来炸到地下四层楼。我当时买的时候是便宜了20%，到最后流通的时候是亏了20%。所有机构投资者普遍亏损达到20%以上，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不是这些人有问题，是市场有问题了。资本市场供需矛盾发生了变化了，没有需求，只有供应。股票是源源不断的。我是一个投资比较谨慎的人，我认为我在这个资本市场上赚不到钱，几乎没有个人能够赚到钱的。

刘益谦，这位沉浸A股市场20年的投资者，现在基本进入休息状态。他表示当初敢承担风险，是因为有政策红利，因为风险大而收益更大，而现在，一切市场条件都变了。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以为够便宜的股票，估值还在下移。对于楼市，他认为房产由于需求的存在，还是该涨。但是政府对房产的调控坚决不动摇，使楼市的涨跌还处于迷雾中。他认为中国的富豪普遍需要寻求心理平衡，努力成为文化人，而艺术品则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他现在收藏品的资产配置比，远远超过了股票，在艺术品市场中寻找他的交易对手。

叶檀：转了一大圈，其实给各位提供的信息，第一股市是有风险的，第二房地产也比较有风险，第三艺术品是少数人的游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的是怎么保值？汪义平：其实要看你的钱是什么时候要派用场。不急用的钱，要找长期投资的机会，我仍然相信长期的价值投资。需要用的钱最不应该投资的是流动性比较差的东西，像房子和艺术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尽量分散。

刘益谦：我们有一种逻辑性的思维，这个市场上没有投资机会了，下一个投资热点在哪里？其实西方现在已经有这种现象了。很多老百姓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愿意去买一个国家的国债，国债都是要亏钱的，负收益的。叶檀：您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吗？刘益谦：时代肯定是没有的。中国的投资者有可能5年10年以后做这种选择。资本不一定要去逐利的，有的时候资本要能守得住。特别是在经济波动特别大的时候，微亏一点儿，我认为还是能接受的。

叶檀：虽然说我们经常很愤怒地说，我们这个市场跟赌场一样，甚至还不如赌场。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投资市场有规矩，我进去之后，我只要守规矩就能够赚钱，这个市场就叫有效市场。而现在就我本人，我认为进入这个市场，稍微谨慎一点儿的好。（整理：国视）

##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pp118@126.com。

《新财富夜谈》是一档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制作，每周日晚23:17在甘肃卫视播出的高端财经周播访谈节目，由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女士担任嘉宾主持。本版每周一回放该节目主要内容，敬请留意。